

当代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演变

祖雪晴

【内容提要】 作为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行为风格的综合体,政治文化对政治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它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同时也在政治体系的作用下也发生变化。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全面社会转型导致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基础发生根本改变,从而使政治文化发生裂变。普京执政后,大力整合国家社会,“政治一致”日趋明显,政治行为风格亦随之趋于保守内敛。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对当前的“全面现代化”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关键词】 俄罗斯 政治文化 叶利钦时代 普京时代

【作者简介】 祖雪晴,1973年生,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讲师、博士。(哈尔滨150080)

“政治文化”是探讨俄罗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概念自1956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首次提出后,便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一个广泛流行的重要的分析性概念。作为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体系,政治文化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心理,它的涵盖面也相当广泛。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希望,俄罗斯的政治系统“极其开放、具有韧性”,“与不断变动的、透明和多维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与那些自信、自由、殷实、具有批判思考精神的人的政治文化相符合”¹。政治文化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它还是在发生着变化。“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动。同时,由现存的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机会和压力也影响着那种政治文化。当人们边学习边行动并通过行动来学习时,文化和结构、态度和行为之间就不断地发生相互作用。”²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理论阐释也有助于我们解析俄罗斯当代社会。

苏联解体后的20年间,大规模的全方位转型使得俄罗斯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时使它的政治文化也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大致以世

纪之交普京上台执政为界,我们可以发现,在俄罗斯社会,不论是统治阶层还是普通民众,其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等都已经前后迥异:整个社会情绪从激进过渡到保守;政治制度趋于稳定;政治权力趋于封闭,权力运作已经由前台转入幕后;民众犬儒主义盛行,民粹主义重新抬头,等等。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演变进行考察,追溯其变化的原因,同时分析其对俄当前政治发展的影响。由于“政治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对其定义也较为多样,本文的政治文化大致指政治思维的倾向性和政治行为的风格。以政治思维倾向性而言,政治文化表现为这一时期政治思潮主题的变化,包括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政治认同意识的变化以及对合法性的态度;就政治行为风格而言,它体现于政治制度结构上的变化以及政治行为的规范性等。

¹ ¼°ÄÄ» ¼¼¼¼¼¼, «ÄÄÄ°Ñ, ÄÄÄÄ¼¼¼¼». http://www.gazeta.ru/comments/2009/09/10_a_3258568.shtml.

² [美]加·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声明》实际上促使了一个“独立王国”的出现,使俄罗斯的国家统一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个问题一直到第二次车臣战争才得以解决,但俄罗斯中央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造成的创伤至今都无法愈合。

在俄罗斯社会转轨的进程中,上层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分裂是最为根本的分裂。由于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心理结构——国家主义一直占据上风,共同的利益显然优先于个体的利益。这种优先性保证了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但是也在共同利益趋向与个性自由、自我实现之间埋下了隐患。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意图通过社会转型改变这种状况,精英层希望通过西化方案,激发社会的活力,使个性的实现成为可能。但是由于俄罗斯历史上并没有民主制度,十月革命前的君主制没有提供广泛的民主和政治自由,苏联时期的社会中也不存在多元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行为。因此,骤然的政治开放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结构,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混乱。不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其政治思维中的固有模式并没有打破,无法适应新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多党制的确立没有带来成熟的政党制度,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的大小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缺乏明确的导向,也缺乏固定的群众基础,因而成为单纯追求选举、追逐权力的工具。对于上层精英来说,原有政治结构的打破和新制度的确立为他们争权夺利提供了空间;而对于下层民众来说,由于民主选举没有建立起公正的代表权力机关的管理结构,政治社会化的各种形式被破坏,新制度下的所谓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却无从实现,宣称代表他们的党派与其说为了他们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民众所谓的政治参与,只是在无所适从的选举中投下自己的一票。虽然民众的政治热情被空前地激发起来,但是他们的力量变得更加软弱。同时,政府所推动的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使俄罗斯社会阶层出现严重分化,新兴的权贵阶层掠夺了人民的财富,使大多数民众陷入贫困。经济上的不自由与政治上的所谓自由形成对比¹,在经济不自由的情况下,政治自由的实现无从谈起;民众渴望改变,但是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改变。

在叶利钦时期缺少共识的政治文化中,政治

行为的风格模式却在逐渐发生变化,它主要体现在全社会政治参与的加强以及政治宽容的逐渐形成。俄罗斯素来以国家主义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导向,在传统的威权主义政治文化中,一直强调社会的同质性;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形成了这种“政治一致的文化”²,不仅沙俄时期是如此,苏联时期亦是如此。在国家权力层面上,威权性政治往往不容异见的存在,“政治一致”是通过暴力和强迫来实现的;但是在社会层面上的“一致”却是根植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系统发生了变化,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模式在制度上得以确立,因而传统的“政治一致”格局被打破,公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政治参与得到了加强。虽然“俄罗斯缺乏作为西方议会制基石的自由论争的文化,冲突往往导致分裂、对抗”³,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充满了“街头政治”,漫无节制的游行抗议活动造成了社会的巨大混乱;但是新的政治行为风格也在逐渐形成。它体现在政治竞争者中出现了文明的辩论方式,每一方都希望以有利的论据说服对方;在政治运作中,更强调妥协以及联盟的艺术;采取各种积极的方式,包括利用大众媒体,对立法、行政权力机构施加压力;进行积极的社会动员来达成具体的目标。最为重要的,乃是各种政治力量在既定的政治游戏规则中进行斗争。一个具体鲜明的例子是1994年2月国家杜马宣布对1993年十月事件和1991年八一九事件的所谓“叛乱者”实行大赦。因为根据新宪法,杜马有权不经总统和联邦委员会批准赦免任何一个人。这项大赦措施在俄罗斯政坛引起强烈反响,被民主派视为“内战的开始”;叶利钦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来阻挠大赦,但最终他承认了杜马决议的有效性。大赦“以游戏规则而不是赤裸裸的权力的胜利而告终”⁴。从反对党俄罗斯共产党来说,它接受了议会斗争的手段,不再以暴力革命作为自己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也说

¹ [俄]A. O. 博罗诺耶夫:《俄罗斯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和作用》,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4期。

² “政治一致”是俄罗斯国家历史形成的文化特征,它不仅存在于沙俄时期,苏联时期亦是如此。在国家权力层面上,威权性政治往往不容异见的存在,“政治一致”是通过暴力和强迫来实现的;但是在社会层面上的“一致”却是根植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系统发生了变化,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模式在制度上得以确立,因而传统的“政治一致”格局被打破,公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政治参与得到了加强。虽然“俄罗斯缺乏作为西方议会制基石的自由论争的文化,冲突往往导致分裂、对抗”,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充满了“街头政治”,漫无节制的游行抗议活动造成了社会的巨大混乱;但是新的政治行为风格也在逐渐形成。它体现在政治竞争者中出现了文明的辩论方式,每一方都希望以有利的论据说服对方;在政治运作中,更强调妥协以及联盟的艺术;采取各种积极的方式,包括利用大众媒体,对立法、行政权力机构施加压力;进行积极的社会动员来达成具体的目标。最为重要的,乃是各种政治力量在既定的政治游戏规则中进行斗争。一个具体鲜明的例子是1994年2月国家杜马宣布对1993年十月事件和1991年八一九事件的所谓“叛乱者”实行大赦。因为根据新宪法,杜马有权不经总统和联邦委员会批准赦免任何一个人。这项大赦措施在俄罗斯政坛引起强烈反响,被民主派视为“内战的开始”;叶利钦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来阻挠大赦,但最终他承认了杜马决议的有效性。大赦“以游戏规则而不是赤裸裸的权力的胜利而告终”。从反对党俄罗斯共产党来说,它接受了议会斗争的手段,不再以暴力革命作为自己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也就是说

³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257页。

一 俄罗斯政治文化之根

一个国家的历史及其传统毫无疑问地影响到它的民族心理,并进而影响到其政治文化。雷蒙·阿隆专门为此构造了“政治系统的历史环境”这个术语。在他看来,“每个政治系统都会受到这个国家所固有的一系列传统、价值、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¹ 俄罗斯的“历史环境”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俄政治文化发育的独特地理环境,二是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在此过程中构建的各种制度和观念。

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对俄罗斯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由于地处欧亚两洲,两种社会文化类型在这里交织:欧洲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它以个人及其自由、自然权利为中心;亚洲文化有着悠远的专制传统,它以社会、集体和国家为中心。两种文化在俄罗斯不仅相互补充,同时还持续地相互斗争。这种二元性、矛盾性和冲突性在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最为明显且一直延续至今的体现,乃是“西化派”和“本土派”、西方发展模式和俄罗斯独特道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其文化属性来说,俄罗斯显然是欧洲大家庭的“边缘成员”,其位置犹如太阳系中的冥王星²。但正是这种亦亚亦欧、非亚非欧的地理与文化位置,使得历史上俄罗斯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并无恒定的方向,在此路不通的情况下马上掉头,另起炉灶。这也是许多论者所强调的所谓“钟摆性”和“周期性”³。俄罗斯历史上几次大的转向以及革命都体现了这些特点,俄罗斯政治文化似乎超越不了这种心理结构定式。

由于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独特轨迹,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东方色彩更浓,突出的特点是一以贯之的国家主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国家观念。别尔嘉耶夫曾说:“俄罗斯人民创造了世界上最强的工具,最大的帝国”,“建立、维持和捍卫庞大的国家的需要,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占据着十分特殊、压倒一切的地位”⁴。俄罗斯自拜占庭不仅输入了基督教,而且还接受并改造了拜占庭的文化,首先就是帝国思想。在传统的历史论证中,如此广袤的国土、如此众多民族的大帝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进行操控,

这便是俄罗斯专制政权存在的理由。同时,伴随帝国崛起与拓展的还有俄政治文化中强烈的救世意识——“第三罗马”思想,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布尔什维克意欲建立超民族和超国家的政治共同体的努力。

“强国思想”一直是俄罗斯民族意识中个体、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恒定结构。不论是在沙皇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没有强大的国家是不可能获得国际承认的。因此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强力塑造苏维埃政治文化,使其沿着国家主义的方向前进。苏联解体之后,国家主义传统一度有所削弱,但普京执政之后,随着联邦中央权力的加强和垂直权力体系的重新确立,它很快就被恢复并得以强化。

另外,由于俄罗斯一直缺乏公民社会,因而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国家被视为“文明的支柱、社会完整及存在的保证、整个生活的组织者”⁵;这种感受反映了国家的实际作用。而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则被视为国家的“大家长”,也为后来的“铁腕”和“民族领袖”之类的个人崇拜提供了发展的温床。俄罗斯历史传统中的“家长制”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法制家庭⁶;严峻的气候和自然条件迫使一家之主负责调节整个家庭的财产关系、劳动关系、日常伦理关系以及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由这种社会初级结构逐渐形成了权威型的权力关系,并进而影响到国家权力结构的形成。而东正教在宣扬俄罗斯伟大的同时,激发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民众的忠君意

¹ Aron R. *De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 P. 1965. p. 92.

² 雷蒙·阿隆:《极权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3页。

³ 欧亚主义强调俄罗斯“非亚非欧”的独特的地理属性,并进而演绎为一个独特的“发展之地”。

⁴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之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

⁵ 雷蒙·阿隆:《极权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3页。

⁶ 雷蒙·阿隆:《极权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3页。

⁷ 雷蒙·阿隆:《极权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3页。

